

19.0
广州青年运动史资料丛刊

五四运动在广州

资料选编

广州青年运动史研究委员会编

编 者 的 话

一九一九年由北京学生首先发动的反帝反封建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转折点。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青年运动的起点。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青年运动就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走上了彻底革命的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革命运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广州是人民革命的策源地，在历次革命运动中，广州青年都站在斗争的前列。一九一九年，当祖国面临危亡的严重关头，北京数十万青年学生首先英勇地吹起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号角，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革命口号，第一次把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掀起了全国规模的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生长在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名城——广州的先进青年，和全国青年一样，立即投入了五四运动，向帝国主义、卖国贼、投降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五月四日，在广州东堤“东园”广场召开了抗议、声讨帝国主义、卖国贼的“国民大会”；举行了爱国示威大游行和罢课斗争；发动了检查、抵制劣货，捣毁、焚烧劣货；打倒“三大亡国公司”的群众运动，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写下了广州革命青年运动光辉的一页。

今年是五四运动六十五周年。为了学习五四时代青年的光辉榜样，继承和发扬五四时期中国革命青年运动的光荣传统，我们编辑出版了《五四运动在广州》这本资料选编，为各级共

青团组织进行青年运动光荣传统教育提供辅助教材,也为总结、研究青年运动的历史经验收集、积累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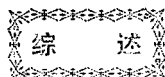
本集文稿除了综述“五四运动在广州”一文请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党史教研室副主任胡提春同志撰写外,其余稿件为回忆录和资料两部份。回忆录均选用曾在报刊、文史资料上发表过的,五四运动亲身参加者撰写的文稿,其中选辑了许德珩同志的《锄奸不惜死,来把中国救》一文,是为了帮助青年读者了解五四运动在北京的情况。资料选辑部份,主要选用五四时期的报刊资料,由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沙东迅同志负责辑录。采取回忆录及资料兼收刊用,是为了能互为补充,互相印证,力求比较翔实、具体、生动地反映五四运动在广州的史实。

本书由广州青运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编辑,限于水平及经验不足,错漏、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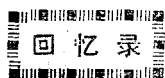
一九八四年三月



目 录



五四运动在广州.....	胡提春	(1)
--------------	-----	-------



锄奸不惜死 来把中国救.....		
——五四运动的片段回忆.....	许德珩	(20)

广州学生“五四”运动记.....	邓曾骧	(36)
------------------	-----	--------

参加五四运动两次被捕的回忆.....	张殿邦	(45)
--------------------	-----	--------

我在“五四”运动中的一些经历.....	郑彦范	(52)
---------------------	-----	--------

回忆广东的“五四”运动

与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	谭天度	(57)
-----------------	-----	--------

“五四”运动后广州青年学生的 一些革命活动.....	郭瘦真	(67)
-------------------------------	-----	--------

“五四”运动在广州资料选 沙东迅 (73)

1. 广州学界对巴黎和会 and 北京五四运动的通电
..... (73)
2. 广州国民大会之盛况 (75)
3. 追悼郭钦光烈士 (77)
4. 五月底排日货风潮 (80)
5. 第一次大罢课与罢课后的活动 (84)
6. 广州的罢市、罢工运动 (91)
7. 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 (97)
8. 先施风潮 (113)
9. 第二次罢课、广州人民声援山东、福州人民的
斗争 (120)
10. 马克思主义在广州的最早传播 (125)
11. 广州五四运动时的几份传单 (126)

五四运动在广州

胡 提 春

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中国爆发了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群众性的爱国民主运动——五四运动。从此，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它不再属于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属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3页）。因此，五四运动在我国近代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由于在这次运动中，青年学生起了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一九三九年，党中央便把五月四日定为我国的青年节。本文拟重点介绍五四运动在广州的经过情况及其影响。

一、五四运动前广州的政治状况

辛亥革命后不久，革命胜利果实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所篡夺，他们对内继续巩固和加强封建势力的剥削与压迫，实行独裁统治，并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大肆出卖国家的权益，使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第

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袁世凯政府对外投降政策，乘着西欧列强无暇东顾的时机，大举侵略中国，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袁世凯为了称帝，一方面废除了由孙中山所建立的国会和临时约法，一方面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卖国密约，以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但这个独裁卖国的袁世凯，做了八十三天的“中华皇帝”之后，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声讨下很快就败亡了。袁世凯死了之后，张勋复辟。北洋军阀段祺瑞打败了张勋，攫取了中国政权，他继承袁世凯的衣钵，对内拒绝恢复被废弃的约法和国会，实行武力专制的反动政策；对外执行卖国求荣，投靠日、美帝国主义的政策。仍承认“二十一条条约”，并以此获得了日本的大借款，强化其反动统治。

为了反抗段祺瑞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独裁政策，孙中山于一九一七年七月由上海来广州，八月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发表“护法宣言”，联合西南各省宣布自主的军阀，于九月成立西南“护法”军政府。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这样就形成南北两个对立的政府。段祺瑞主张采取“用武力统一”的办法“征讨”西南“护法”军政府。但北京政府中的冯国璋则害怕段祺瑞的势力扩大对己不利，便策动四个省的督军联名请求南北议和。南方政府的军阀们，早就对孙中山“护法”运动不感兴趣，他们所以要打着“护法”的招牌，目的是借机扩充自己的实力，因而对议和主张表示支持。一九一八年五月，一方面向北洋政府求和；另一方面改组军政府。通过政学系操纵的非常国会把军政府改为七总裁合议制，推选唐绍仪、伍廷芳、孙中山、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林葆懌七人为总裁，以政学系首领岑春煊为主席，孙中山实际上被排斥了，他一气之下，辞去了大元帅之职，离广州去上海。这样广东的实

权便掌握在桂系军阀莫荣新（督军）和翟汪（省长）手里。

孙中山离粤后，一九一九年二月南北政府便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这是南北政府暂时的休战，和谈并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南北政府尽管表面上有区别，但在镇压人民的爱国运动方面却没有本质的不同，是一丘之貉。

五四运动前夕，由陈独秀、李大钊等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在广州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青年学生，关心国家大事，纷纷组织团体，认真学习、讨论《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所发表的文章，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对苏联十月革命特别向往。一九一八年五月，北洋军阀政府与日本政府秘密签订旨在干涉苏联十月革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消息传出后，激起了全体留日的中国学生的愤怒，为了表示强烈抗议，全体罢课归国。其中有十名留日学生回到广州后，便到各学校去做报告，揭露北洋政府与日本政府相勾结的罪行，使广州学生非常气愤。这就是五四运动前广州的政治形势。

二、五四运动在广州的经过情况

一九一九年，当北京爆发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广州后，各界人民纷纷起来响应，致电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特别是青年学生，表现更为积极。五月十一日，广州国民外交后援会，联合各界群众在东堤草坪举行国民大会。会场两旁悬挂着巨幅的对联，左边写着：欲杜强邦先歼国贼；右边写着：不申正义曷号公民。会场的四周贴满了“誓杀国贼”“保我国权”等标语。会后数万群众（其中学生最多，广州几乎全部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都参加了）列队示威游行，沿途高呼“还我青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誓杀国贼”等口号。行至

军政府门前（现越华路省民政厅），由大会代表向军政府提出三项要求：（一）、取消“二十一条”和一切不平等条约，直接收回青岛；（二）、严惩国贼；（三）、释放被捕学生。

五月十八日，广东教育界在九曜坊教育会举行会议，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正义斗争，并通知各校开展运动。五月二十五日上午，教育会又通知各校派出代表在高等师范学校开学生会议，到会的有五十多间学校的学生代表，通过了包括致电巴黎和会力争归还青岛及取消各种密约、挽留北大校长蔡元培、联合全国及世界学生、举行学生大游行、组织调查劣货会、组织学生义勇团、组织学生工厂、举行追悼五四运动牺牲的北大粤籍学生郭钦光烈士大会等十项决议。五月二十六日，各校学生齐集高师，举行追悼郭钦光烈士大会，实际上是誓师大会，到会学生都十分悲愤，于是广州的五四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当时广州中等以上的学校有五十多间，但没有统一的学生组织，只有为了联系感情的校友会。在这些学校中，对政治活动起作用较大的是广东省高等师范学校（简称高师，地址在小东门现在的鲁迅纪念馆）、公立法政学校（校址在天官里，即现在的法政路）、广东省第一甲种工业专科学校（简称工专或甲工，校址在西村增埗）。为了解决对学生运动的领导问题，迫切需要建立全市统一的学生组织，但各校代表在讨论如何开展运动时，对待罢课问题发生了分歧，因而产生了两个学生组织。一个是“广东省会学生联合会”简称“省会学联会”，基本队伍是高师和岭南大学，还有省立女子师范及南武、培英、培道、真光、青年会中学、复礼女师、女子体育、柔济女医、妇婴产科、女子职业传习所等二十三间（其中女校占十一间），它的特点是教会学校多、女校多。选举高师的李朴生为会长。

他们认为广东护法政府与北洋军阀政府有本质区别，反日救国已开展了一年，可以通过与政府合作，达到救国的目的，主张采取“和平行事”，“力学救国”，反对罢课，反对过激行动。在成立学联时发表的宣言中指出：“中日密约，中外轰传，亡国丧家，祸迫眉睫，吾侪学生，受国家之培育，为社会之中坚”，号召大家奋起救国，但把“磨拳擦掌、淘淘涌涌、群起而骚动”等从事实斗争的群众运动斥之为“过激的”、“外强中干”、“五分钟热情”、“无济于事”等等。“省会学联会”成立之后，举办过平民学校、职工学校十余所，帮助市民学习文化，了解时局；在假期还派出“巡回讲演团”到四乡演说等等，十月五日还创办了“广东省会学生联合会月报”，除报导该会活动外，也发表一些时评、小说和诗歌，都以宣传爱国道理为内容，由于女校多，对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方面的宣传活动也较重视。

另一个学生组织叫“广东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中上学联会）其基本队伍是省工专和公立法政学校。还包括广东光华医药专门学校、广东公立医药专门学校、韬美医药专门学校、公立医药专门学校、私立广州法政专门学校、广雅、执信、培正等将近三十间（其中包括明达、志诚二间小学的学生）公推张启荣（公法）、周其鉴（甲工）为正副会长，并选出阮啸仙、刘尔崧、陈肇棠、云逢瀛、邓曾骧、符明昌、马福午等为执委，分工领导各项活动。“中上学联会”下设总务、宣传、检查、教育四个科。他们主张“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为支援全国学生运动，应该实行罢课，到群众中去宣传发动和组织检查抵制日货，认为这才是真正救国的方法，而“力学救国”是逃避现实斗争，空谈救国论调。还认为广东的桂系军阀政府是挂着“护法”招牌，反对孙中山的“护法”

主张的，与北洋军阀政府没有本质差别，应与之坚决斗争。“中上学联合会”成立之后，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宣传、组织开展抵制劣货（即日货）斗争方面。

两个学生组织虽有原则分歧，但在反对帝国主义、抵制日货、宣传新文化思潮等方面是一致的。因此，有些活动是联合进行的。在全国学联召开会议时，广州两个学生组织都派代表参加，全国学联希望广州两大学生组织采取团结合作的方针。但在会议上对“中上学联合会”从事现实斗争的活动备加赞扬。后来“省会学联合会”起了分化，高师就有三分之一的学生退出，参加“中上学联合会”。

当时为什么要把抵制日货作为这次爱国运动的主要内容呢？有些人对其意义不够理解。而“中上学联合会”把这一斗争一直坚持到一九二〇年底。他们认为：第一，我国是日本商品最大的倾销之场所，日本将其倾销所得充当军政费用，如日本海产税就是用来养活海军的，若能坚决杜绝日货，就是给日本以致命的打击，可以迫使日本改变对华态度，取消“二十一条”；第二，抵制日货可以增加北洋军阀内外困难，打击亲日势力，加剧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第三，提高群众爱国主义思想，对发展民族工业有利。学生联合会在宣传抵制日货的同时，还协同各界开办一些小型工厂，专门制造日用百货，如小五金、竹、木等用品和化学工业品等，不少学校还开办学生工厂，制造日用品，如高师学生就成立了“学生工厂”、“学生贸易部”，他们自己生产了大量的“高师棍”（广州人称洗衣肥皂为番棍）供应市场，很受欢迎。总之在当时，支持或反对抵制日货，已成为爱国或卖国的一个重要标志。

开展抵制日货的运动，它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得到孙中山的支持，却遭到奸商和军阀政府的反对，甚至他

们勾结起来对学生和革命群众进行残酷镇压，其手段之毒辣比之北洋军阀，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运动一开始，督军莫荣新、省长翟汪，省会警察厅长魏邦平等人，便于五月三十一日发出镇压广东学生及各界人民响应五四运动的布告和函电。把革命学生污蔑为“不法棍徒”，声言要“严飭军警认真弹压”“尽法惩办不贷”等等。甚至连成立学生组织，进行爱国宣传都不允许。比如当“广东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木制牌子一挂出，魏邦平就叫警察前往公立法政学校去把它拆毁；当学生需要印刷传单等宣传爱国道理时，警察厅又马上勒令所有印刷厂商具结，不得承印有关五四运动的各种文件和宣传品，违则拿人封铺。还派出军警破坏学生集会示威游行和抵制日货等活动。甚至用卑鄙的手法撤换支持学生运动的进步校长，逮捕学生领袖，开除革命学生的学籍等等，企图把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镇压下去。但是，青年学生和各界群众，不畏强暴，不受欺骗，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进行英勇的斗争。这里列举几宗与反动当局和奸商作斗争的事例。

1. 同三大亡国公司的斗争。

当时经过学生的抵制日货的宣传，大多数商号都接受学生的检查，不再买卖日货。但是也有少数奸商，自持有军阀政府做后台，不理睬学生的警告，照样经营日货，最突出的是广州三家最大的百货公司：长堤的先施公司（即现在市一商局中百站大楼）、西堤的大新公司（现在的南方大厦）和十八甫的真光公司。被群众憎恨地称为“三大亡国公司”。一九一九年五月三十日，各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宣传抵制日货，沿途演出活报剧。当队伍行至先施公司时，群众高呼“打倒亡国公司”“抵制日货”等口号，约三百名学生冲进去检查劣货，但

该公司赶快把铁门关上，三百人被困在里面过了一夜。当学生队伍到大新公司时，守卫的商团竟鸣枪恐吓学生，愤怒的群众便把该公司的橱窗玻璃等打烂。游行队伍到了真光公司后，也发生了殴斗，群众将柜面、门窗玻璃打烂。被困在先施公司内面的三百学生，经过与武装警察斗争之后，于第二天被放出来，但被逮去七名学生骨干。为了营救被捕学生，抗议奸商与警察勾结镇压学生，第二天发动全市学生（包括小学生在内）进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贴标语、散发传单和告各界同胞书，大家举着“惩办凶手”、“营救被捕同学”、“打倒三大亡国公司”“抵制日货”、“打倒警察厅长魏邦平”等标语。学联在组织示威游行的同时，派人去到工厂、商店串连，争取工人和商号的支持，河南工业区的各工厂，都表示声援学生，南华煤厂等召开大会，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如当局不放出被捕学生，就举行罢工，商人也在酝酿着举行罢市。魏邦平在群众的压力下，怕把事情弄大了不好收拾，便把全部学生释放。这是第一次斗争。但检查日货的工作是不断深入发展的，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中上学联会”又组织全市大规模游行，队伍里有舞狮队、化装队、音乐队、灯色队等，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增加热闹气氛，当队伍行至长堤先施公司时，受到警察阻拦，于是发生了冲突，进行搏斗，当场有范曾滂等四名学生被打重伤，后来死去。过了几天，全市学生在东堤八旗会馆门前旷地开追悼大会，到会成千上万的人，有的痛哭失声，悲愤交加，会后举着范曾滂等四人的遗像进行游行示威。队伍到达长堤先施公司时，群众齐声高呼：“为死难同学复仇”等口号，即将该公司负责人拉出来，在胸前挂上“先施亡国公司凉血司理马璇德”及“先施亡国公司凉血部长区耀”的白布字条，使群众认清奸商面目。经过多次宣传和斗争，把

“三大亡国公司”搞臭了，群众都不到亡国公司去买东西，相当一段时间“门堪罗雀，生意萧条”，那些南来的国会议员，就住在先施公司隔离的东亚酒店，他们也贴出“国会议员不入亡国公司”的白布长条幅。这些亡国公司搞了许多花招来招徕顾客，但群众仍不受骗，最后该三公司声言，如矛头不再指向他们，那就可以供给两个同学往欧美留学的费用，或捐款一万元作会费，但学生仍不为所动。制服了“三大亡国公司”之后，抵制日货的声势更加扩大，不论是商号或个人，再卖或再用劣货，一经学生指出，就立即改正。如老威药房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还保存宣传日本“仁丹”的招牌，把日本天皇的照片放大至五、六尺大，挂在药房顶上。游行的学生发现后，包围这个药房（即现在北京路的健民药房），要该药房取下日皇照片，封存日货，老板立即答应，这时军阀沈鸿英骑着马，四个卫兵跟随着，一进入人群便被包围了，要他将头上戴的台湾草帽（当时台湾为日占领）取下来，沈见人多势众，不敢违抗，立即把草帽取下撕烂丢掉，还说我也要爱国。

2. 反对军政府迫害进步学生和学校领导的斗争。

莫荣新、魏邦平等反动当局镇压五四运动的一个毒辣手段就是撤换支持学生运动的进步校长和老师，开除学运骨干。因此，“中上学联会”便组织学生与反动当局作坚决斗争。这里举几个例子：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等同志，都是当时工专学运的领导人，也是全市有名的学运领导人和中坚分子，由于他们积极参加全市抵制日货活动，亲自组织学生游行示威，到各公司去检查劣货，与“三大亡国公司”进行过坚决斗争，因而奸商通过警察厅长魏邦平，勾结当时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的校长黄强，于一九一九年六月间，以“聚众扰乱治安”的罪

名，宣布开除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三人的学籍。这一倒行逆施，立即激起全校师生的义愤，举行罢课抗议，在同学们的坚决斗争下，终于迫使反动当局撤销原来的决定，恢复了阮、刘、周三位同学的学籍。不久，工专的校长改由高仑担任，这个家伙不仅镇压学生运动，而且专制独裁，贪污公款、任意解雇教师、职员，并开除了七名进步学生的学籍。于是，工专学生在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等人的领导下，一九二〇年夏以“刷新校政”为名，发起驱高运动，他们通过集会、通电、散发传单、游行示威和请愿等形式开展斗争，一直坚持了三个月，终于取得了胜利，撤销了校长高仑的职务。被开除的七位同学复学，因此，工专被群众称为“红色甲工”。

公立法政学校，当时也是“中上学联合会”的基本队伍之一。许多进步学生站在斗争的前列，其中有个进步学生符明昌，是“中上学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负责联络工作。一九一九年七月十日，广州及各县群众几万人在东园举行国民大会，会后进行示威游行，并发动商人罢市等，就是他具体组织的，他在这次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怒斥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并当众咬破指头在白手巾上写着：“同胞警醒，共图挽救，未达目的，誓死一心”十六个字，表示反对帝国主义惩办卖国贼的决心。这一革命行动，激起全场极大的反响，恨不得把卖国贼杀尽，把帝国主义赶走，收到很好的效果，连警察见此情景也表示同情，不敢阻拦群众的游行示威。但符明昌这种爱国行动却被反动当局当做“不法棍徒”，把他和另一位“中上学联合会”的负责人云逢瀛（他们都是海南文昌县人）开除学籍，押送回原籍，交当地监管。但在学生的坚决斗争，和海南人民的帮助下，不久这两位学生又回广州继续参加运动。公立法政学校还发生过反对军政府撤换校长的事件。当时的军政

府，认为法政学校代校长姚礼修纵容学生运动，决定把他撤职，并派何澧文接替，何在军警的护送下来上任，但受到全校学生的反对，学生丢石头痛击何澧文，使之不能接事，结果就不了了之。又如河南慕黎中学校长刘慕黎，是一个仇视学生运动的人，他在一九一九年六月间贴出布告开除二名“中上学联合会”的积极分子、该校学生会领导人郑彦范、冯菊坡，在布告中写道：“查本校学生郑彦范、冯菊坡提倡家庭革命，侵夺校长职权，鼓动罢课风潮，实属不法之极，除将二生开除学籍，着即离校外，并已呈准教厅转饬所属公私各校不予收容……”，布告贴出后，广州当时支持学运的《天民报》揭露了这个问题，还挖苦地评论说，“提倡家庭革命，就只有侵夺父权，断无侵夺校长职权之理，而该布告接着就说侵夺职权，这不是校长讨学生便宜，以学生家长自居，就是狗屁不通，不配一校之长……”使社会舆论哗然。在这同时，该校学生作出集体退学的决定，迫使学校当局不得不收回开除二生的成命。

3. 学生智斗魏邦平。

魏邦平是一个投机政客，原是粤军的一个头目，后来投靠桂系军阀，充当莫荣新镇压人民的刽子手。在五四运动期间，处处与学生和革命群众作对，逆潮流而动。因此，群众对他非常愤恨。许多被捕的学生，在他审问时，据理与他作斗争，揭露其反动本质。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六日“中上学联合会”检查队长张殿邦等九人在西堤省港码头检查劣货，竟被警察捉去，由魏邦平亲自审问这批学生，魏摆着厅长的架势对张殿邦说：“你是何处歹徒，为什么要到处捣乱？”张义正词严地回答：“我是学生，检查劣货系爱国的行动，为什么说是捣乱？”魏又说：“既然是学生，无权无勇，手无寸铁，捣毁商人货物，救

什么国？”张答道：“学生虽无权无勇，但抵制劣货，挽回权利，总算尽了国民一份力量，厅长既然有权有勇，何以坐视亡国不救，是否甘心做亡国奴、卖国贼呢？”驳得这个堂堂厅长哑口无言，只好叫人“扣押候办”。为了营救被捕的同学，“中上学联会”组织了二千余学生，围困警察厅，要求魏邦平出见群众。魏以为自己有限权威，一说，学生就会听的。他出见学生时，神气十足地说：“被拘押的九人，多穿白衣杂服，类似无赖歹徒，要查明是否烂仔，是否有意捣乱，方能释放。”话音未落，在场学生立即抗议，并讽刺地质问：“你说学生白衣杂服的就属烂仔歹徒，那么厅长也穿着白衣白鞋，岂不是成了烂仔歹徒的厅长么？”这一反问，激起群众的热烈鼓掌，大家大声叫喊：“打倒烂仔厅长！”气得魏邦平脸部发涨，气呼呼地缩回院子里去了。

4. 烧毁和安泰劣纸事件。

烧毁和安泰劣纸事件发生于一九一九年九月下旬。这是一次与奸商、军阀政府和日本驻穗领事馆直接斗争的一个事件，它反映了广州学生、群众抵制日货的决心勇气和智慧。九月下旬某日，日本三井洋行运载白报纸二船，为避免学生检查，准备午夜运往佛山与和安泰商号交易，这事被“中上学联会”知道了，连夜派人跟踪追赶，天明把这两船纸截了回来，靠泊在天字码头。这时，日本领事馆出面向莫荣新交涉，莫即令魏邦平负责追还，魏利用看守同学吃午饭的时候，命令警察游击队同一班雇佣的喽啰打手，硬把洋纸搬往商会，以为这样事情就了结了。但“中上学联会”经研究后，认为这应该用智取，不可硬攻。便派人去佛山，一面与和安泰联系，叫他们向警厅具结领回洋纸，一面与佛山学生联合会密商，要他们协助。和安